

## 第一章 艰难旅程

人高马大的共产国际顾问，在中国农村的  
一只小船里蜷缩了两天两夜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下旬，正是中国江西的初秋季节。

夕阳衔山了，像一个圆圆的大火球，照得小河里的水波光潋滟，一部分被染成了玫瑰色，与被岸边树木的倒影妆成黑色的那一部分相映衬，甚是美观。晚风也来了，给夏热已退的黄昏注入了了一丝凉意。岸边的树上，有的叶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树枝，悠悠荡荡地飘到了水面上，顺着水流的旨意向下游漂去。但走不了多远，河水还是逐步吞没了它们。

岸边，除了树木，还有生长得非常茂盛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丛不约而同地向河里倾斜着，伸展着它们的枝条和绿叶。

在这河边的灌木丛下，很不显眼地泊着一只小木船。几个渔民样的汉子正在大口大口地吞着饭。只是他们并不很专注，而且彼此之间也不说话，个个都在用不安生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哪怕偶尔有一个小孩从岸边走过，也会引起他们的格外注意。

小小的底舱里发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盖板被推开了，一

个毛茸茸的人头露了出来。

几个正在吃饭的人都怔住了。但他们刹那间又都清醒过来。为首的一个汉子连忙紧张而又不敢高声地轻叫：“不能上来！不能上来！”但他又马上想起那毛茸茸的头虽然和一般人一样也长了两只耳朵，但却听不懂他的话。他扔下饭碗，两只手不住地往下按，用这种手势表达他语言的意思。

那毛茸茸的头乖乖地缩了回去。

“都整整两天两夜了，老是蜷在那里边也真是够难受的。”另一个汉子苦笑了一下说。

“那怎么办！”做手势的汉子说，“出来，要是碰上国民党，那不是没命了！再难受，活着总比死了好！再说，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咱，要是他真的丢了命，咱们仨的头也差不多要掉喽。”

夜幕终于拉开了，渐渐地完全笼罩了四周。河面上更加寂静，因此增加了安全的感觉。在狭小的底舱里闷了整整一个白天的人，终于获准来到甲板上。

那人爬出底舱，站到甲板上，首先迫不及待地长长地伸了几个懒腰，算是舒展了发酸的身体，然后，大口大口地呼着气。比起那几个渔民打扮的人，他几乎是整整高出一个头。在稀疏的星光下，他的眼镜和牙齿闪闪发亮。

那几个渔民模样的人正忙着一边倒水，一边摸出罐头之类的食品，侍候这个大块头、白皮肤、白牙齿、戴眼镜、满脸胡碴、黄头发的人吃饭。他们只知道他是个外国人，或者说是个很重要的外国人。他要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也就是位于江西省南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去。其他的，就一概莫知了。

那个外国人食量很大，而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转瞬间，一大堆食物就全进了他的肚里。他惬意地笑着，掏出一只长长、

硕大的烟嘴，把一枝香烟塞进去。一个汉子给他点上火，他像表示谢意一样地点了点头，然后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有滋有味地吐着一团团白色的烟雾。

护送他的这几个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但他自己自然十分清楚 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担负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推翻中国国民党的统治。

远处，有手电筒的亮光划破了夜幕，而且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不等别人示意，奥托·布劳恩便敏捷地掐灭了烟头，熟练地爬进底舱。

脚步声越来越近，手电筒的光亮不停地在船上划过，接着是纷乱的对话声。奥托·布劳恩听不懂这些中国话，但他凭直觉和经验，就知道是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巡逻兵，那些兵正在盘问那几个打扮成渔民模样护送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员。

危险 又一次临头了。

几天前，更夜深人静之时，他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带着去年春天从苏联进入中国时使用的奥地利护照，拎着盛满衣物和美元的皮箱 悄然离开在上海的住处 来到码头 登上一艘英国轮船，开始了向中央苏区进发的旅程。

两天以后，这艘挂着米字旗的轮船顺利地抵达了汕头。有人在码头上接他，与他对上了暗号，把他安排进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位会讲英语的姓王的地下交通员护送他从沿海向内地进发。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外国来中国考察旅游的考古学家。

“我们马上就要到潮安县县城了。”王交通员告诉他。在快到达潮安县县城的时候，他们下了车，改为步行。进城的时候，被两名端着大枪、佩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士兵喝住。两个士兵充满狐疑地上下审视着眼前看上去有点稀奇古怪的人，

枪上的刺刀明晃晃地发着寒光。这儿是通向共产党占据的中央苏区的重要路口，国民党士兵正在例行严格的检查。面对盘问，奥托·布劳恩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脸上作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来。胖胖的王交通员却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介绍说，他陪同的是一位奥地利的友人，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专程来中国考古。到这儿来，是因为他听说附近有一座古庙，而他偏偏又对这座古庙很有兴趣。

滴水不漏的解释 合法的外国护照 使盘查的士兵看不出什么疑处。而且 他们是奉命检查“共匪”和那些有可能向“匪区”偷运物资的人，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会有外国人朝“匪区”跑。两人放下枪，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

化险为夷了。以后一路顺利，他们很快到达了韩江。王交通员把他交给已经在那里等待着的另一名交通员，就匆匆告辞返回了。这新交通员很负责，但遗憾的是他不懂任何一门外国语言，不像王交通员那样曾在基督教学校读过书，在军阀冯玉祥的军队里担任过牧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他，虽然在上海闲得无聊的时候也学了点汉语，但毕竟微乎其微，因此与新交通员之间无法进行任何交谈。他只能随着他走，跟他来到这只小船上，爬进狭小的船舱。

空间的压抑 空气的沉闷 孤独的寂寞 奥托·布劳恩无可奈何地忍耐了五十个小时。而更可怕的是危险又一次逼近，而且比上一次要凶险得不知多少倍！上一次毕竟有公开的身份作掩护，合法之外还有合情合理的因素，在紧要关头可以用来巧辩。而这次，一旦被发现，只怕是即使把德国的骄傲——哲学大师康德请来，也只能哑口无言了——一个有身份的奥地利人，居然蜷缩在中国农村的小渔船里，怎么解释也都于情理不通。

奥托·布劳恩大气都不敢出，心脏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

着。“绝不能被发现！绝不能暴露真实的身份！”他一遍遍地暗中警告自己，鼓励自己。但他更知道，自己此时此地已是束手无策，书写结局的笔掌握在别人手上——掌握在那群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身上，他只能听从于命运的摆布。

突然，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有人跳上了船。重重的脚步声就在头上不停地响起，粗鲁的吼叫声更加清晰可闻。奥托·布劳恩觉得那只无形的巨手一下子把他的心脏攥死了，他浑身的血液刹那间停止了流动。

“完了！”共产国际派遣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小船又猛烈摇晃了一阵，接着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奥托·布劳恩终于渐渐清醒过来，恢复了意识。啊，上帝保佑，又一次死里逃生了！那几个巡逻兵一时粗心，没有下船舱，没有发现他。

他又一次庆幸。他知道万一暴露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身份不仅和他自己年轻的生命紧紧相联，更与派遣他的人们拴在一起。一旦暴露，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而且他的派遣者也将面临难堪。

死里逃生之后，小船终于缓缓而行

可怕的脚步声早就听不见了。尽管夜越来越深，河面上的风越来越大，但小小的船舱仍然很闷。奥托·布劳恩睁着眼睛躺着，烦躁不安地听着从甲板上传来的那几个交通员香甜的鼾声。他已经迷迷糊糊地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此时自然毫无困意。刚才的险境让他惊魂难定，所以也无心思再上去。

到这只小船里已经整整两天两夜了，怎么还不开船呢？奥托·布劳恩既焦躁不安，又疑惑不解。他努力让自己的修养压抑着情绪，不让内心的想法表露出来。当然，语言不通，他也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表达。他突然觉得自己此时此地如同一只珍贵的动物在被运送的途中，不管这动物多么价值不菲，但也只能听任搬运者的处置。

老呆在这儿，还会碰上什么事呢？天知道明天还将发生什么事，天知道前面还会有多少危险！越思越想，奥托·布劳恩越发不寒而栗。自己才三十三岁啊，往日的辉煌历历在目，胸中的抱负正待施展，而如果真的在此地丧生，实在太不值得了。

“忍耐、坚持，到了共产党的苏区，一切就都好了！”奥托·布劳恩在心里这样鼓励、安慰自己，又把双手在胸前合成十字，虔诚地闭上眼睛，默念着：“上帝保佑，共产国际保佑！”

共产国际对奥托·布劳恩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而且颇具些神秘色彩的字眼。

19世纪的40年代，当英、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逐渐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风云际会之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预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共同行动的结果，要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到在历史紧要关头取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彼此隔离的现象，从而奠定工人运动国际团结的基础，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而这个国际性的组织，既要争取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国际性目标，也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经济、政治特点和该国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完成各国自己的任务。

两位世界巨人为了这个目标，百折不挠，呕心沥血地奋斗着。

终于，历史的契机降临了。1863年1月22日，波兰人民为反抗沙俄的殖民主义统治，举行了武装起义。继而高举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于5月宣布独立，建立了波兰国民政府。很快，沙皇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一年的7月22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召开大会，声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大会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并建议召开有美、德、法、英、意、波兰等国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大会。马克思参加了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热烈的欢呼声中，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哲尔高声宣布：“全世界工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建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组织就这样诞生了，它的名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史称第一国际。

国际工人协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八年以后，由于各国反动政府的刁难和迫害，也由于内部的种种矛盾，国际已经无法正常运转。1876年7月15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城宣告解散。

十三年后的7月14日，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国际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和激化，最终从名存实亡走向彻底破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建立新的国际的想法，在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脑海中越来越强烈。而且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革命风起云涌，芬兰、奥地利、波

兰、匈牙利、瑞典、希腊、德国等国的共产党相继建立，更为建立新的国际提供了成熟的条件。1919年3月12日也是三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名代表聚会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开宗明义：“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为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奋斗。”

奥托·布劳恩清楚地知道第三国际建立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名义上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但实质上已经以苏联为核心。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共是世界上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共产党，而且，它还拥有任何一国共产党都望尘莫及的武装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完全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的关注。共产国际在成立的第二年，即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帮助策划建立共产党，次年又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的首次代表大会并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并协助制定了中共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的第二年就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往来更加频繁。后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索性搬到莫斯科去开。中共的领导人选，都由共产国际指定。

而今他奥托·布劳恩，也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派遣，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国度！但是，比起维经斯基、马林等帮助中国建起了共产党的人，他有着特殊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在此时的中国 国民党执掌着政权 共产党及其部队还被称

作“共匪”，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名正言顺的外交关系。想到这里 奥托·布劳恩的脑海便浮现出一身戎装的斯大林及其视为格言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武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于是 奥托·布劳恩又觉得这个威风凛凛的世界巨人真的有些不可思议的手腕——一边甜笑着与某个国家的政府进行着交往，一边不择手段地使用种种方法去企图推翻它。按照斯大林的论断，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自然就是军事了。共产国际在直接操纵和干预中共党内事务的同时，又不断地从苏联派遣一些军事专家和顾问到中国，参与中共武装斗争的决策。奥托·布劳恩就是其中的一员。

接受了任务，刚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奥托·布劳恩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经过了简单的准备，十四天后，他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登上了横越西伯利亚的快车。到了满洲里，从那儿换车，到了中国的哈尔滨。他住在那所颇有俄罗斯情调的中国东北城市 数次从那儿到了南方的上海 观察、了解情况 并与中共中央秘密取得了联系。这几次旅行像从苏联到哈尔滨一样 顺利安全。到了 1932 年的秋天，奥托·布劳恩正式走马上任，移居上海。

刚到上海 奥托·布劳恩住在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几个星期后，为了取得一种能够使自己不受怀疑进行活动的社会背景，又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

奥托·布劳恩很快熟悉了这座中国的东方都市。黄浦江的江面上，停靠着一艘艘飘扬着太阳旗、米字旗、星条旗的外国军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 外国人的警察耀武扬威 市场上满目的进口货；在跑马场、赛狗场和林立的舞厅与夜总会，赚足了中国人钱财的人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而在港口和街道上，

到处是骨瘦如柴的苦力和乞丐。

此时的上海，表面上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警探们，白天把大的工厂搜了又搜，夜晚把居民区查了又查，还有便衣军警暗中盯梢、跟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几年中间，数以千计的人或被杀头，或被枪决，甚至被绞死。而对这种社会冲突的认识，除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阶层比较敏感外，其他市民大体上是模糊的。

在这种情况下，奥托·布劳恩尽管有护照，又在“租界”里居住，危险很小，但也不得不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小心谨慎地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布置的活动。特别是有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的前车之鉴，更让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公开的场合，他只与外国人交往，偶尔到俱乐部去散散心，也尽量速去速回，力争不引人注意。暗中，他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保持着秘密接触。

与中共领导接触，通常每周一到两次。奥托·布劳恩由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带领，悄悄到中共的秘密办事处去。每次都加倍小心，看清窗台上设置的平安信号才敢进去。在那儿，奥托·布劳恩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博古以及洛甫等人，常常就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共产国际与设在江西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主力红军保持着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共中央的电台。沟通三方的联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都由这几个人在这个秘密办事处完成。奥托·布劳恩曾经好几次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的附有草图等等的形势报告，通过信使安全转送到莫斯科，让上司很是满意。

刚刚过去的事历历在目。虽然也是地下工作，但却比现在蜷在这小木船里舒服得多，安全得多！

奥托·布劳恩满腹怨气，弄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时间进入梦乡的。当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透过缝隙射进船舱中。他张大嘴长长地出了口气，用力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很快恢复了清醒。他听到了轰轰作响的机器声，并且从小船轻微的颠簸和与河水的撞击声，觉察到小船已经在行驶。霎时，一种正在逃离险境的感觉涌上心头，使他悬心放下，烦躁顿释。想到以往来华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都是躲在外国驻华机构，通过电台和信件对红军进行遥控指挥，因此效果都不佳。这种惯例，将由他来打破 奥托·布劳恩既激动又自豪。

他很想走出这闷人的小船舱，到甲板上去舒展一下发酸的身体。早晨的河面上，空气一定是格外新鲜的，两岸的景色也说不定很美。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一旦出去被人发现，一定会惹出许多麻烦，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谁叫自己长得跟中国人不一样呢，一个大鼻子、高个头的外国人出现在这样的小船上，能不引人注目，使人怀疑吗？国民党早已觉察出了苏联的把戏，多次抗议中国有苏俄间谍在活动。自己若是暴露了真实身份，性命不保不说，还会引起巨大的国际争端，后果太可怕了！

像前两天早晨醒来后一样，渔民打扮的人弄水给他刷了牙，洗了脸，在狭小的船舱里吃了早饭。奥托·布劳恩像当年坐牢时盼望着放风时间一样忍耐着，眼巴巴地等待着黑夜的再次降临。

估计快到中午时分 奥托·布劳恩终于憋不住了。他悄悄地把头伸出来 前后巡视了一下 接着马上缩回去。

他发觉这只小船已经与许多小船联在一起，排成了一长串，由一艘机动货轮拖着行进。这一切肯定是昨天夜里进行的。于是，他又有些烦恼了，埋怨不该白白地让小船在灌木丛中等了两个昼夜。难道就是为了等待挂上这艘货轮而省力吗？他简直有些不可理解，觉得中国人真是懒惰成性，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时

间观念。但又转念一想，觉得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全——混合在大队船只中一起行驶，与单独行动相比，大概不容易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和怀疑吧。

小船在平稳地行驶。听着清晰可闻的机器声和小船拍打河水的撞击声，伴着小船轻颤的节奏，奥托·布劳恩感到很惬意。他觉得苦难和危险正渐渐地逝去，安全与希望正一步步地走来……

奥托·布劳恩终于第一次见到了红军战士，  
但进入中央苏区的路途却更加艰苦

小船悠悠荡荡，缓慢地行走着，两天以后的夜晚，又悄无声息地脱离船队，靠了岸。

几个渔民打扮的交通员弄醒了酣睡着的奥托·布劳恩，他们个个脸上都有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在小船舱里蜷缩得难以忍受的奥托·布劳恩爬上甲板，在别人的扶助下跳上岸。他贪婪地用力吸吮着清新、舒爽的空气，使劲地伸展着高大而酸痛的身躯。他虽然只有三十三岁，但却已有过几次坐牢的经历，他记得，几次出狱时的感觉，好像与现在差不多。

他跟着人们离开岸边，走向树林密布的村头，进了一间亮灯的房子。

房子里摆着几排货架，凌乱地放着一些日用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杂货店。

店里已经有十几个人，显然是早在此等待着了。他们个个都显得很年轻，穿着粗布的衣服，打着绑腿，灰布帽上缀着一颗红星。奥托·布劳恩心头一热，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就是来自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战士！这儿可能就是从上海出发前在秘密地图上见到过的大埔联络站。

这十几个红军战士每人都背着一枝毛瑟枪，腰上还别着一枝小手枪，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技艺和所执行的任务不同凡响。在上海时 奥托·布劳恩对江西的中央苏区有过一番研究，知道虽然那儿早在 1931 年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个国中之国实在贫穷得很，而且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也都十分不易，粮食、食盐、布匹和武器的供给非常困难，因此普通的红军士兵不可能有这样的装备。

三个渔民打扮的交通员与这些红军战士亲热地握着手，奥托·布劳恩也伸出手去同他们依次相握。这些红军战士大概都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个个用好奇的目光敬畏地望着他。

渔民打扮的交通员们又转过头来，一一同奥托·布劳恩握手。奥托·布劳恩明白，他们要就此分别了。几天来在小船上蜷缩得痛苦不堪，但这时 奥托·布劳恩同他们握手告别，心里竟又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没有多等待 奥托·布劳恩跟着专程前来迎接他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又连夜出发了。

原以为，离开那又窄又小又矮又闷的船舱，陆地上的行程一定会好一些。但很快 奥托·布劳恩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在小船里，除了那有惊无险的一幕外，顶多不过是沉闷而且无聊而已，但在陆地上，却要自己用两只脚一步不停地走。乡村的土路狭窄、弯曲、高低不平 而且为了安全 为了避开国民党兵的岗哨和巡逻队，常常是连这样的小路都不敢走，必须避开村庄，绕到树丛或田野里。

在黑乎乎的夜里 踏着坑坑洼洼的路 奥托·布劳恩简直无法同这些走惯了黑路和坏路的红军战士相比。别人驾轻就熟，

健步如飞，而他却如履薄冰，跌跌撞撞。特别是他的眼睛近视，虽然戴着眼镜，黑暗中看东西仍不如正常人清楚，几次险些摔倒，人们只好耐心地搀扶着他慢慢走。

终于 东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 天快亮了。但领队的战士却命令大家停止前进，躲进树林里。人们躲进树丛深处，折一些树枝 抖开随身带的雨布 算是搭了一个棚 让奥托·布劳恩钻进去休息。派两个人出去放哨 其余人都围躺在这“帐篷”边。

奥托·布劳恩两条腿又酸又重，浑身更像是散了架一般，躺倒就不想再动。虽是 9 月下旬 天气已不十分炎热 但成群结队的蚊虫居然在大白天也嗡嗡地叫着，轮番向他发动袭击，让他应付不暇，烦恼不堪。当然，更让他苦恼的，是现在仍然与在那小船上一样，连一个同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说不准都还是文盲呢，更谈不上会俄语或英语了。而自己，来中国一年多虽也学了几句汉语，但学的是官话，而这些战士所使用的肯定是方言，所以仍然只能像在小船上一样，谁也听不懂谁。

睡了吃 吃了睡 等到夜幕完全笼罩了大地 大家又一起出发，重复着昨夜的经历。

领头的战士姓卓名雄。他还不足二十岁 加上个头矮小 因此看上去更像个娃娃兵。但事实上，他却堪称中央苏区的老交通了。他机警勇敢，责任心特强，许多次重要护送任务的出色完成，使他在比他年龄大得多的伙伴中享有绝对的威信。更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半年以前，他接送过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博古等人进入苏区。那次至关重要的接送中，多少次危急，都被他与他的同伴们化险为夷了。大概正因为如此，几天前，苏区中央局的机要处处长匆匆忙忙找到他，郑重而神秘地向他传达了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布置的任务。

“告诉你 这可是邓局长亲自点了名要你去完成的 到大埔去接，多带一些人。你们要接的这个东西实在太重要了，一定要完好无损地接回来！特别要注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要保证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敌人抢了去！”

“是！”卓雄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他意识到这重要的东西一定事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和前途，说不定是电台、文件或者高级武器什么的。

但是他们接到的 却是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活着的外国人！卓雄不时悄悄地端详着他那高大粗壮的块头，那一张毛茸茸的长脸和一双毛茸茸的手，一副玻璃片后面的大眼睛和大嘴里露出的大大的白牙齿。

这个外国人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有什么用处，值得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卓雄心里直犯嘀咕。但是，虽然心中疑惑，可行动上他却丝毫不敢粗心大意。上级交代的任务，又是如此重视，肯定自有道理。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天职。

但奥托·布劳恩的心里渐渐失衡起来。回想着一路上受到的惊吓和委屈，强烈的怨尤让他闷闷不乐，特别是几天前还在享受着的大上海灯红酒绿的安逸生活，更加使这艰苦、危险的旅途越发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等待那个叫弗雷德·施特恩那个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总顾问，那个僵硬无能的混蛋，我早就同博古等中共领袖一道进入苏区了，哪会像现在这样，像一头既聋又哑的牲畜 被人捆绑着走！”他心里直想骂。

奥托·布劳恩自 1932 年春天秘密进入中国后，在东北呆了一段时间，接着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局协助中共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用无线电接收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指示，遥控指挥千里之外的江西中央苏区军民的反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他感到中

国苏区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太低了，曾建议在瑞金建立一所正规的培养红军指挥员的学校。听说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却不知真正的效果如何？

到第二年的春天即 1933 年的春天，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出了叛徒，大量的地下组织几乎被国民党破获殆尽，更加剧了白色恐怖威胁的严重性。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早已跑到莫斯科去了，把“负总责”的事交给了他在东方大学时的同学博古。此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于是，请示共产国际，建议将中共中央局迁到江西的苏区。在共产国际来电决定同意后，博古、洛甫、陈云等人便立即动身。本来，也安排了奥托·布劳恩同行，但共产国际却坚持要他等到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抵达上海以后再走。那个弗雷德在不慌不忙地游历了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以后终于姗姗来迟。这样，奥托·布劳恩在博古等人到了中央苏区半年以后才得以由上海赶来。

“要是同博古他们一起走，不仅条件可能会好得多，而且途中还能谈谈话，决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奥托·布劳恩又怨又怒。的确，博古、洛甫等人都在苏联留过学，同属“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俄语讲得呱呱叫，与他们在上海时，谈得十分愉快。

## 第二章 进入苏区

登上一座山头，共产国际顾问的眼前  
出现了一片崭新的气象

两天下来，奥托·布劳恩已经腰酸腿疼，疲惫不堪。虽说白天尽可以躲在树丛中蒙头大睡，但却怎么也恢复了不体力和精神。实在睡不着的时候，他悄悄爬出“帐篷”向四周观望。映入眼帘的满是荒芜的田野、破烂的村庄。行人寥若晨星，开始发黄的野草在秋风中寂寞地抖动……这一切，都是几年来内战的痕迹。

又熬到夜晚，又上了路。没有月亮，星光黯淡，高度近视的奥托·布劳恩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跟着一帮年轻战士跌跌撞撞。走了好久，也许走了不少的路了吧，突然，前面响起了一阵枪声。

奥托·布劳恩的心一下子被攥紧了，被提了起来。语言不通，他无法问人，也无法听懂别人在说些什么。反正，他们又原路返回了，然后绕了很大的一个弯，绕过了预定通过的村庄。走了这么多冤枉路，脱险后的奥托·布劳恩气不打一处来。

又是一天一夜过去了。在天将破晓的时候，战士们没有按惯例停下来钻树丛，而是继续朝前赶，到了连绵起伏的大山的脚下。战士们的兴致看上去高起来了，那个领头的小个子几乎是